

鹿城文史集粹

LU CHENG WEN SHI JI CUI

· 下冊 ·

鹿城文史集粹
25



鹿城文史 25 萃

鹿城文史集粹

(下册)

教育医卫
文化艺术
宗教交通
其 他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13年10月

鹿城文史集粹

鹿城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开本：850X1168mm 1/32 印张：25 字数：573千字

版次：2013年10月 第一版

内部发行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 任：黄克敌

副主任：陈世尧 李嘉昌 金文平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苏 虹 宋乐稣 陈钧贤 武连春

林其勉 周建春 奚慧君 黄如萍

董约武 蔡钢铁

教育医卫

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女学

苏 虹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清政府不准开设女学，唯恐“男女授受不亲，有伤风化”，连大力提倡西学的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也认为“中西礼俗不同，不宜设立女学”。但在1907年以前，温州先后还是出现多所女学。单城内就有育德（1878）、艺文（1904）、爱群（1906）、大同（1907）等女学。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女学，系外国传教士所创办，温州也是如此。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女学，是英籍传教士曹雅直（译音）夫妇所创办，始于清光绪四年（1878），距今已119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依仗不平等条约，在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又派遣大批传教士前来我国布道

传教。最早来温州开荒布道的是英籍传教士曹雅直，他住宁波一年半后，于清同治五年（1866）10月，由一位姓朱的翻译（宁波人）陪同，乘海轮来温。曹氏跛脚，行走靠拐棍，甚是艰难。市民见他碧眼黄发，棕胡满腮，加上西装革履，形象十分怪异，心里既厌恶又惧怕。每当曹氏外出传道时，一群好奇的少年尾随追赶，他们边掷瓦片、小石，边嚷道：“洋鬼”、“红毛番”、“独脚番人”。曹氏常被围困得无法脱身，他听不懂温州话，只好撒一把铜钱让尾追者拾取，而后耸耸肩乘隙逃脱。

曹雅直到温州后，先是住晏公殿巷某客栈，次年正月才租住大南东城下黄岩林屋；年余后，又迁至花园巷张姓房子。他虽然使尽浑身解数，在城里设教传道一年多，但到头来仅有补鞋匠叶钟杰一个信徒（据传，南门还有一绰号叫“黄蒂”的与叶同时洗礼）。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曹氏才采取“办学开路”的办法。他认为传教首先要博得市民的信任，而办学，是征服民心的最佳手段之一。于是，延聘一位住在南石桥底姓刘的老学究，于1868年在寓所办起一所男书院，后取名为“崇真小学”。

随着男书院的创办，就学的男子日渐增多，他们后来都成了信徒；但却没有一个女信徒。此时曹雅直深感自己孑然一身，一来脚疾不时发痛，无人照料；二来吸收女信徒，也急需一个女帮手，因而求婚心切。他听说英国新派来女传道士薛某，当即赴沪与她见面，经一段时间接触后，于1870年在宁波结婚。婚后夫妇相偕来温，其妻通过学习温州方言，熟悉温州民情，而后广泛与妇女交往，多方动员她们信教。曹氏夫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愿意信教的女子仍寥寥无几。几年后，他们决定仿效宁波的做法，增设一所女书院，藉以吸引女信徒（宁波英籍传教士爱尔德赛，早在1844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书院。从此女信徒日益增多）。曹氏夫妇经一番筹划之后，温州第一所女

书院于1878年在曹氏寓所诞生了，后取名为“育德女学”。

当时，女子读书风气未开，加上女书院浓重的“洋”味，一时为市民所难接受。其时，社会上曾风传洋人挖心肝、喝人血；女书院开始招生时，又有人说，洋人办女书院是“黄鼠狼向鸡拜年——不安好心”。温州女子顾虑重重，家长也竭力抵制，谁都不愿去做“试验品”。

曹雅直身居温州十年，深知温州市民的贫困，遂决定以金钱、物质为诱饵，广施小恩小惠。当时规定，入学者，与男书院享受同等待遇，即供给膳宿、衣被、书籍及笔墨纸砚，每月并补助其家庭十块银元。但必须签订合同，规定：入学后必须学道、学女红（缝纫）；不准裹脚，已裹脚的应即放开；读至十八九岁时，由校方代为择配信道家，不得嫁给教外人；遇有要事或年假回家，须经校方批准方可离校。合同上特别说明：上述各项必须切实遵守，若有违反，加倍偿还一切费用。由学生家长立下字据并画押，以示郑重。

合约中虽有几项甚为苛刻，但其经济待遇之优厚，对于一些长年难得温饱的市民来说，确实具有很大诱惑力；再加上不准裹脚，更博得深受裹脚之苦的女子的好感。从此，入学者日渐增多。刘廷芳（温籍著名学者，早年留学英国哥伦比亚大学，是我市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英国剑桥、牛津等大学教授）的母亲李玺，与曹氏夫妇过从甚密，当时曾受聘在校管理女生事务，并负责指导女红（缝纫），后在该校任校长。刘廷芳的两个妹妹文端（燕京大学毕业）、文庄（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当时也在校就读，后来，还在该校任过教。

女学课程与男学同，开始只授四书五经和新旧约圣经，并参加宗教活动。此后，随着我国女学的逐渐兴起，课程的设

置也渐趋一致，增设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也有了音乐、体育等课。不过，该校对学生传布最多的仍是崇洋、亲洋思想。校方无时不在学生面前颂扬英、美等国如何发达、富强，讥讽中国如何如何贫穷、落后，致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

为了维护“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女学的管教十分严格，学生入学后几乎与外界隔绝。每日大门上锁，校外男子严禁入内；即使是亲属探访，也限时在会客室交谈。平日学生不许与男子交谈，更不许通信。星期天做祷告时，女生坐教堂左边，男生坐右边，彼此不许相互招呼，也不得侧目而视。曾在该校毕业、后任该校校长的黄秋芳女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倘若学生违反上述校规，“就囚在小屋禁闭数小时，或罚吃淡饭数餐，甚至用皮带拷打至红肿。”黄女士说，学校简直像一座监狱。瑞安籍女生孔琼芳，因与男子通信，受校方多次训责；一位叫爱莲的女生，因与男子通信而被开除。

校方曾一度不准在校内悬挂中国国旗，不许开设地理、历史课；至于各种社会活动，更不许学生参加。民国成立时的庆祝活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卅”纪念等等，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演说、张贴标语，育德女生却不准走出校门一步。校方把女学美化成“世外桃源”，而学生们却视女学为“只（紫）禁门”、“冷宫”。

曹氏夫妇之后，英国先后又派衡平均、黄国珠（女）、慕传荣（女）、王廉夫妇等前来主持校务。1927年间，王廉夫妇慑于我国汹涌澎湃的反帝浪潮，无可奈何地离开温州，避居上海（或返回英国）。随后，学校由中国教会接收自办，由教会自行组织校董会，自筹经费，自聘校长、教师，入学女子比前大为增加。数年后，因地方当局禁止在校举行宗教仪式和附设宗教课程，曾一度停办。后崇真、育德二校合并为“崇真

育德圣经学社”而复校；抗战胜利后，二校各取一字，更名为“崇德小学”。1949年以后重新整顿，改组了校董会，以高建国为董事长、杨炯为校长，又继续办了两年多，最后由温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此后，女学早就不再单独存在了。

纵观育德女学的创办，其实质是列强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但在当时，作为一种社会新生事物，确实给温州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使温州女子从深闺走进课堂，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原载1997年《鹿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艺文学校始末

蔡钢铁

艺文学校是19世纪末由温州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它是西方近代教育在温州产生影响的开端，在温州近代史上曾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

艺文学校原称艺文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温州基督教偕吾会创办。光绪十二年（1886）偕吾会先在市区康乐坊创办艺文小学堂，招收少数学生，实行新式教育。1897年，在艺文小学堂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偕吾会在瓦市殿巷（今墨池小学校址）又创办了艺文学堂。英教士苏慧廉任校长，英籍牧师谢道培负责英语部，另聘一位温州教师负责其它课程。初期规模较小，学生仅20人。当时苏慧廉一朋友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大、中学堂教科书，艺文学堂即采用该局翻译的中学教科书作为教材。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原租民房不够使用，又增租一间。校方增聘温州一位有名望的古典文学教师任教中国文学课。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一直是该校的主课。

随着学堂影响的扩大，入学人数不断增加，校舍愈显拥挤。校方决定择地另建新校舍，并动员各界捐助。苏慧廉一朋友捐款500英磅，苏慧廉夫人在英国筹集了800英磅，英国差

遣委员会也捐助巨款。1902年，校方在海坛山麓购地20多亩，动工兴建校舍，工程于次年竣工。新校舍为西式建筑，规模恢宏，建筑精致，有教室、教研室、校长室、接待室、餐厅、礼拜堂和可容纳90人的学生宿舍。教室宽敞，设备先进，其规模在当时堪称温州之首。新校舍在今温二中校址。

新校舍落成后，学堂即行迁入。为了区别于原学堂（原学堂规模、设备均较简陋，尚属试办阶段），校方将新校舍的落成，作为艺文学堂的正式开学日。1903年10月12日，新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温处道童兆蓉、温州镇总兵刘祥胜、温州知府王琛、永嘉知县秦国均、地方著名士绅、经学大师孙诒让及英教士李提摩太等都应邀出席。温州府学、县学和中学堂的教师及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学计、方言两馆的部分师生也参加了典礼。会上，苏慧廉、李提摩太和孙诒让相继发表演说。孙诒让说：“苏先生开设这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吾温州地方的民智，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细，各种教科，无不齐全。兄弟登堂瞻礼，如亲身到西洋看学堂，心中不胜欢喜。”

新校师资扩大，教学设备亦趋齐全，并于当年开齐课程。有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图画、神学和修身等课。初级英语作为选修课。三、四年级的地理、算术等课用英文授课。

英人蔡博敏自1902年起任艺文学校校长。据艺文学校1922年的《同学录》记载，当时该校任课教师为：国文伍守彝、潘绍廉；算术章文谦、郑猛；英文蔡博敏、周勤、李景贤；国文兼历史吴鸿年；英文兼物理杨联芳；英文兼地理、博物、理化孔黎惠；体操胡方成；算术兼图画詹庆铨。1906年，在册学生200人，其中走读生40人，住校生120人，在外膳

宿学生40人。

二

艺文学校办学20多年，共培养学生千余人。成绩突出者被留校任教，有的在海关、邮政等部门担任要职，有的成为其他学校的校长。也有一些学生受进步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学生进大学深造，成为专业人才，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如著名的李得钊烈士，1922年从艺文学校毕业后，即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担任重要工作；后遭国民党逮捕，在狱中被折磨致死。他的革命事迹和英勇精神一直为人民所赞颂。著名教育家谷寅侯，早年就读于艺文学校，后考入金陵大学，毕业后回艺文任教英文、理化课程。

“五卅”运动时，谷寅侯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与学生一起脱离学校。为使离校学生能继续读书，他邀集热心教育者，积极筹办瓯海公学。并变卖自己的家产捐助办学，后被推举为校长。其他曾就读于艺文学校的著名人士还有：温州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庭芳教授；30年代左翼作家、为中国戏剧创作和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著名戏剧家董每戡；著名医师、先后担任温州第二医院院长的陈梅豪和郑求是；率部起义、配合温州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将领叶芳；曾为人民立功的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曙等。

三

艺文学校的兴办对温州教育事业客观上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作为教会学校，它办学的主要动机是为教会服务，其最终目的是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服务。十九世纪下半叶，列强纷纷入侵中国。教会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力量从各方面

为殖民主义效劳，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他们认为，中国牧师在传教方面比外国牧师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为此，1919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发表《夫至大至圣》通谕，要求所有统治教区的外国主教培养本地人员。

温州教会创办艺文学校，他们希望从温州青年中选拔培养出一批神职人员，为其在温州发展传教事业服务。对此，艺文校长苏慧廉在其所著的《在中国传教》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说：

“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智力上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希望他们在离开我们时有着比本地学校学生更高的道德资质，但是我们最希望的还是他们具备终身为之进行精神奋斗的唤醒的灵魂和启蒙的觉悟。”

为此，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督教的教义教育，校园内宗教气氛浓厚。学校规定，全体学生每天参加祈祷，全体住校教师及学生每个星期天参加一次礼拜活动，其它的礼拜可自由选择。英籍教师山尔曼每星期举行一次基督英语活动，有一百多个男学生自愿参加，他们中的多数来自异教徒家庭。高年级以一本《新约书》作为其英语课程的一部分。汉译本的《新约》也用于教学。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向学生灌输神学思想，吸引他们信教。

四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后，全国爆发规模空前的爱国反帝斗争，各界人民纷起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艺文学生虽身处教会学校，但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五卅”浪潮波及温州时，他们积极参加温州各界的声援活动。并派代表参加温州学生救国联合会。6月7日晚，他们在校内集会，一致决议脱离学校，以实际行动

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8日上午，三百余学生高呼爱国反帝口号跨出大门，毅然脱离学校。他们还参加11日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表现出学生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和高昂斗志。

这次运动的参加者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在白累德医院工作的艺文学校毕业生、共产党员王屏周，在这次运动中表现非常突出。艺文学生的行动得到该校爱国教师、温州学联会和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原来在校住宿的外县同学，离校后被安置在四明银行内暂住，每日都有许多各校学生代表以及工、商等各界人士前往慰问。

“五卅”运动后，因绝大部分学生离校，艺文学校只得停办。校长蔡博敏回国，1927年又返温州。1929年秋艺文学校恢复招生。早期教师杨联芳任校长，杨慕时任教务主任。1930年，因各方反对，艺文学校再度停办，其后未再恢复。原校具、仪器均归并白累德医院。1929年，白累德医院利用艺文教学大楼和礼堂，创办温州私立白累德高级护士学校。1930年，基督教会又利用艺文部分校舍创办艺文神学院，专门培养温州教区教牧人员。该院于1953年停办。

1994年3月稿

（原载1997年《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

记黄溯初捐产兴办温州师范学校

陈纪业

浙江地区之有师范学校，是从1906年5月开始，称“温州师范学堂”，创办人是瑞安孙诒让，当时他任学校总理。1913年7月改称“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23年9月，师范与中学两校合并，单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名称。1925年6月，原在道司前的师范部改为高中部，仓桥的中学部改为初中部，从此温州地区就没有一所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了。直到1933年秋天，黄溯初献赠平阳私立郑楼农村小学全部校产及教学设备，由浙江省教育厅接收，改为省立温州师范学校，并划定温、台、处三属（旧“瓯海道”）为该校的师范学区，担负着改进浙南的小学教育的重大使命。饮水思源，黄溯初热忱兴学、关怀桑梓教育的高风远识，实在令人敬仰。

黄溯初（1888～1945），单名群，祖籍平阳郑楼，到他的祖父才迁居温州。父亲经商。溯初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湖北法政学堂讲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赶回浙江，协助浙军宣告浙江起义响应。民国成立，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潜赴云南参加蔡锷反袁护国起义，给袁贼以沉重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屡写诗文怒斥日寇侵略。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叛国逃离重庆，与日本侵略者

签订卖国密约，他冒险从港抵沪，力劝汪的亲信高宗武反正。高偕陶希圣出走香港，将汪逆所订密约在报端揭露，中外舆论一致谴责汪逆卖国行径。

黄溯初先生既热爱祖国，又关怀家乡建设。据他自述：“办理学校和医院各十余年之久，担负建筑费及历年经常费几达十万金。”他兴办郑楼农村小学，“规模之宏大，为东南各省之冠。十余年间，培植学生达数千人”。他捐款建立瓯海医院于温州府学巷底积谷山麓，占地宽敞，环境优美，设内、外、五官、妇产等科，为当时温州数一数二的西医综合医院。他还爱好购书和藏书，30年间搜集乡贤遗书四百来种。自1928年至1936年，先后敦聘永嘉刘景晨，平阳刘绍宽到上海寓所，利用藏书校印《敬乡楼丛书》四辑，共28种，78册，分赠国内和东西方各国大图书馆，使温州乡哲著作传播海外。他死后还遗命将全部藏书六千多册捐赠温州籀园图书馆。

抗日战争前期，溯初先生定居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香港为日寇所占领，他走避桂林、重庆等地，不幸抵渝仅数月，患心脏病于1945年4月26日逝世。1947年9月他的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在虹桥公墓。下面就专述黄溯初先生捐献校产，兴办温州师范学校经过及后人建亭纪念的情况。

1921年黄溯初父亲冠圭公九十寿辰时，嘱咐儿子把设宴祝寿的钱，移用在祖籍兴办郑楼农村小学，学生均享受免费待遇。开始时仅有场地五亩多，洋式平房八间，厨房厕所各一。以后历年陆续添购基地，增筑中、洋式楼房平房，到1930年时，已建校舍57间，场圃田荡13亩多，栽植果木蔬菜，“更造室育蚕，筑埭育鸡”，以推广农村副业。当时校中栽培的蜜柑（无核）、花椰菜、羽衣甘蓝（球菜）等从日本等国引入的新农产品，温州市场还绝少发现。

小学的教学设备也相当优越，单拿图书馆的书籍来说，就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和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等，这在当时浙南各县小学中，绝无仅有。正因为具备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加上地理环境优美，校舍宽敞，当时省督学冯克书来校视察后，就向省教育厅建议，改办师范学校。但正遇到省库经费奇缺，一时无法实现。到1933年陈布雷再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拟议在旧瓯海道区（温、台、处三府）设省立师范一所，而校址尚未决定。恰逢黄溯初提出捐助他所办的私立郑楼小学作为师范校舍的请求，教育厅就采纳他的建议。经省政府同意后，委派王学素为校长，立即聘请教职员工，添建学生宿舍、膳厅、厕所、浴室等房屋，并在当年9月间招收师范部（三年制、招初中毕业生）新生40余人，简师部（四年制、招收小学毕业生）新生50余人，积极筹备开学上课。

黄溯初捐献郑楼小学给温州师范的校产，当时估值约三万数千元，根据那时国民党政府《捐资兴学条例》，获得教育部颁给甲字第一百十八号一等奖状一件。1935年黄溯初又把校前的“梦仙公农圃”约十余亩，捐归省立温州师范所有，作为建筑学生教室、寝室、房舍及扩充操场之用。学校又增置附近农田50余亩，作为学生实习之需。温师有了郑楼小学园圃场地栽培柑桔、饲养禽畜等农副产品的优越基础，又有了众多农田栽种水稻（少量小麦）的良好试验场地，以增长学生农事知识和技能。每周农业与实习时间较多，学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劳动习惯和勤奋好学的优良学风，使学校蔚然成为造就浙南地区小学健全师资，尤其是适应农村学校需要师资的教育重心。

1935年，温师校长王学素奉调他处，由教导主任徐芳田继任。王学素精明能干，俭朴勤劳，办学历时两年，为学校奠 393